

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

沈 建 法

【摘要】探讨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的关系，认为城市管治是对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调整，因此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管治的理论基础。简要回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的研究，并从城市政治经济学和城市管治的角度分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人口迁移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管治；城市政治经济学；城市化；政府

【中图分类号】F290，C931

【文献标识码】A

THE URBAN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URBAN GOVERNANCE

SHEN Jianfa

Abstract: As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base of the theory of the urban governance that is regarded as a readjustment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Also, this paper recalls the study in the two respects done by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is included as well particularly in its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Keywords: urban political economics; urban governance

1 引言

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管治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在发达国家，城市的政治和管理结构错综复杂，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和私人机构的经济活动都会对各个利益团体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市不断扩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少沿交通线的农村居民点转变成城镇，在大城市边缘或外围形成所谓“城乡结合体”（desakota）（McGee, 1991）。在这种范围广泛的都市化地区，如何协调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管治的重要课题。

城市管治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改变现行城市管治模式的一种需要，试图通过对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探讨，寻找城市管治问题的根源所

*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2020503。

在，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

城市管治的焦点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调整，主要是处理它们之间超越于市场经济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说，城市管治是要协调和改进在现行法律和市场规则下合法的关系，使这种关系更趋合理。城市管治首先要实行依法管理，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更高层次的城市管治则是要求对现行合法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建立城市体系运行的新的框架。因此，笔者认为城市政治经济才是城市管治的主要理论基础，城市管治的研究要用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2 城市政治经济学研究

城市政治经济学概括地讲就是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城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城市体系的动态。城市政治经济学认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以及

城市社会内部各阶层的不平衡现象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而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讲，在现行城市管治体制下存在的市场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改进或改变上层的城市管治模式得到解决。目前城市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研究主要局限于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城市问题和城市管治问题作出解释，明确提出城市管治对策或模式的还比较少见。许多研究集中探讨如何通过城市管治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早已引起广泛关注。洛杉矶时报在1990年12月18日以“城市移民潮正在使各国社会紧张不安”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在1800年，世界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有1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了2000年，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这一转变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这种毫无控制的转变主要发生在最没有应付能力的第三世界，它将影响迁入城市的移民、城市本身以及世界各国。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连成一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的影响。”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城市和农村地区机会的不平等；第二，在城市体系内部，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国家首都和主要城市；第三，在一个城市内部，少数的富贵阶层同大部分民众之间的贫富差异十分显著。对于不平衡城市化的问题，1950—1960年代正统的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

家一样要经历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造成发展中国家城市长期贫困的根源是“城市偏差”(urban bias)。麦克·李普顿(Lipton 1977; 1984)认为城市的富裕阶层不平衡地分配有限的资源,以补贴他们的城市生活水平。西方国家也存在这种城市偏差,这也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传统的发展主义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中独特的现象。比如,这些国家城市首位度特别高,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在首都和主要城市。如:1990年泰国57%的城市人口集中在曼谷,秘鲁43%的人口集中在利马。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内部,豪富与赤贫现象同时并存。在城市的富人区,富贵阶层的生活水平同发达国家相差不大。在城市的穷人区,大量贫民贫穷失业,生活在贫民窟中,过着悲惨的生活。种种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有学者尝试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提出了控制-依赖理论和世界系统理论。史密斯(Smith, 1996)进一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这些理论认为不平衡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世界系统内扩张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强调在城市建设和人口动态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史密斯认为,个人和家庭的迁移和生育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受到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政策背景的重大影响。同样,通讯和交通网络并不是在空间上均衡分配。有些地方的富贵阶层可以掌握更多资源用于建设道路、电话和电力供应设施。而其它地方则可能没有足够的设施。控制-依赖理论和世界系统理论强调用不同地区参与者之间控制-被控制的关系来解释它们的差异,并认为各地在全球性的控制-依赖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肯特(1995)在《再论从属性的城市——城市发展和社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美国城市的分析是发达国家城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代表。该书用城市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各个不同时代美国的商业城市、工

业城市、后工业城市、中心城市变迁和郊区化的政治经济问题。肯特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尝试用各种新的方法去解决各种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很多方法并不是很有效,有的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里根-布什时代减少联邦政府对城市事务干预的城市政策引起了许多1990年代的城市问题,无家可归者、种族住区分隔、地区税收负担、失业等,种种城市和郊区病变得更加严重。肯特认为美国最严重的城市问题其实是取决于政治抉择,需要政府的干预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才能解决。

由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和区域经济的不断调整使得城市、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政府为了稳定和发展当地经济,并争取选民的支持,需要面对商界、社会团体、公共机构等利益团体的压力做出政策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讲,城市政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在一个范围广泛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从属或依赖的地位。

城市政府同中央政府不同,它不能限制人口、资本和财富在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城市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也不能对进出城市的商品和贸易立法加以限制。一个城市的经济比一个国家的经济面临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因此城市政府要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去提高一个城市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促进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政府的决策可以分成发展政策、再分配政策和分配政策三大类。发展政策可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并增强城市的经济基础。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土地规划和政策、建设基础设施和住房、提供税收优惠等吸引商业投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对低收入者提供福利支持,如生活援助,公共房屋,住房补贴及各项社会服务。由于政府收入来源于付税的个人和公司,而接受福利的人士通常并不从事经济活动,因此再分配政策会提高当地的生产成本,削减城市的竞争力和经济基础。城市的分配政策是指那些使居民和商界普遍受惠的政策,如治安、

消防、街面清洁、垃圾收集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政策并没有明显侧重于再分配或促进经济方面。

大众控制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对城市政策也有深远的影响。它迫使政府官员制订能获得选民支持和同意的城市政策。因此政府官员需要在取得选民支持的政治逻辑和取得市场效益的经济逻辑之间进行取舍。同中央政府相比,城市政府面临的大众控制的压力要大得多,因为居民(特别是富人)和企业家可以自由地从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富人和企业家的迁出可以对城市政府税收和城市经济造成重大损害。城市政府在制订政策时通常要顾及富人和企业家的利益。这也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缺陷,当然,城市政府要经常需要取得大众的支持,并受制于有关的法律和程序。肯特(1995)讨论了纽约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政治经济学对城市问题的解释。第一个例子是纽约市政府与国家广播公司(NBC)之间的交易。国家广播公司设在市中心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已有33年。但1985年该公司宣布为公司寻找新的地址,并正在考虑纽约市以外的多个地点,因为其它地点的费用相对便宜并且搬迁正好可以更新公司的设备。对于纽约市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极不利的事件。因为这影响到四万个工作岗位、数百万美元的政府税收、以及纽约市作为世界主要通讯中心的地位,更不利的是,如果国家广播公司搬出纽约,其它广播公司也可能跟着搬迁,对纽约的打击将非常之大。从1985到1987年的两年时间内,纽约市和州政府的官员一直在同国家广播公司进行周旋,希望它能继续留在纽约。纽约市长爱德华甚至在1987年6月的一个大清早6点钟打电话给国家广播公司总裁怀特,请他考虑纽约的几块土地用作设立公司总部。大清早把他从床上叫醒,甚至使总裁很不高兴。但是纽约市长的焦急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1987年12月底纽约市和国家广播公司终于达成协议,国家广播公司将租用洛克菲勒中心并更新它的设备。作为回报,纽约市

规划研究

PLANNING STUDIES

沈建法
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

政府在未来 35 年为公司减免总值 7200 万美金的地产税，提供 8 亿美金的免税债券，冻结土地税，减免部分商业租金税，减免公司购买 11 亿美金以上新设备的销售税。这些税收优惠总计达到 9700 万美金。

上述例子说明了城市政府是如何依赖于商界，城市政府并不能完全独立地运用有关资源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肯特的第二个例子是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问题。纽约市每年为商业公司提供数百万美元优惠的同时，仍要面对需要资源投入的各种问题，如维护不足的街道和公园，拥挤的课室，不断蔓延的贫民区。政府是否把经济置于社会需求、社会公正之上，为了增加就业机会而牺牲穷人的利益？可悲的是，纽约市没有商界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税收就不能生存，但它并不要求助于无家可归者来实现繁荣。

在联邦政府宣布地方政府必须为自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房屋的规定之后，纽约市长爱德华勉强地扩大了有关的房屋计划。但是他的继任者，对穷人和弱者深表同情的纽约市第一任黑人市长定肯认为把无家可归者送到简陋临时房屋和劣质的旅馆是不足够和不人道的。他上任后迅速改变了有关无家可归者的房屋政策，无家可归者家庭将可以搬入永久性的房屋，同时改进单身住的临时房屋的质量。

以前要求无家可归者家庭需在旅馆中住满一年，现在则只要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搬入临时或永久性房屋。但是不到一年，定肯市长不得不改变这一政策，因为申请政府房屋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因为不需要在临时房屋住很长的时间，所以全纽约及外地的住房条件差的居民纷纷申请，希望获得提供给无家可归者的廉价的政府公屋。申请这种公屋的无家可归者挤满了政府办公室，甚至不得不在办公室过夜。政府不得不恢复旧政策，要求申请政府公屋者先在临时房屋住一年，定肯市长感慨地说，这就像填坝上的洞一样，一个人只有 10 个手指，无法应付坝上的 22 个洞。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城市政府没有商界就不能生存，但同时它又没有足

够的能力去照顾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如何在社会公正与商业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选择。通过建立适当的机制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城市政府还是有可能实现社会公正。

3 中国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中，城市政府也面临着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双重任务。虽然市场经济力量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各项城市政策应该说主要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决定，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性的决定。中国关于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 21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中国建立了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户口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主要在农村，非农业户口则主要在城市。国家根据户口状况决定有关的待遇。总的来说，非农业户口居民享受了许多农业户口居民不能享受的各种福利政策，如就业、教育、住房等等。1980 年代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有这些政策的制订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而非市场力量。当然经济目标也是非常重要，主要是增加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

但是要实现这一经济目标并不一定要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因此实行城乡分割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多于经济上的考虑。

1980 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城乡分割的现象出现松动的迹象（Chan 1996；沈建法 1999）。许多原来同户籍制度配套的制度和限制已逐步废止，客观上造成了农民进城的条件。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在 1980 年代以后被废止，粮食与副食品凭票供应时代已经结束，农民进城以后的基本生活条件可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许多方面需要由进城的外来人口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在客观上对城乡人口迁移起到推动作用。国家及时地推出有关政策则使这种可能变成

现实。1984 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中小城镇落户，从事商业和各种服务活动。随后国家也逐步允许有关企事业单位雇用各种暂住人口。公安部在 1985 年公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规定”，要求在城市或集镇计划暂住超过 3 个月的 16 周岁以上的人，申领暂住证，通常为 1 年，如有需要可以再续。在城镇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则申请寄住证。对城镇暂住人口实行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承认了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城镇地区务工经商这一城乡人口迁移的途径。

估计 1979—1990 年期间，中国每年有 470 万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是中国非农业人口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非农业人口由 1978 年的 1.52 亿增加到 1995 年的 2.82 亿，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15.8% 增加到 23.8%。中国非农业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美国的全国人口。

从 1992 年开始，国家开始推行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制度，即蓝印户口制度。公安部于 1992 年发出“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均开展了试点工作。实施地区限于各类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小城镇，为在当地进行投资设厂、购买商品房的居民，当地需要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及其家属解决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具有这种户口的人员同当地城镇居民享受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据估计，全国有 300 万人已领到了蓝印户口。

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同正常的城镇户口仍有一定的差别。加入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者在入户前须缴纳一定的城镇建设配套费。这一费用各地不同，从 20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具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者不享受国家的副食补贴和社会保障，只享受升学与就业方面的权利。在迁出城镇时，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即行失效，需恢复为农业户口。

1997 年国务院批准进行小城镇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向实行相对自由但有序的城乡人口迁移前进了一步，共有约450个小城镇参加这个试点。在这些小城镇的农村户口人员若符合下列条件即可转为常住户口：一是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二是有合法固定的住所两年以上。

这种小城镇常住户口不收城镇建设配套费，享受同当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入学、就业、粮油关系、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

上述小城镇户口制度试点改革向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实行城乡人口平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任何人只要具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固定的住所，均可以成为当地居民，与当地居民分担同样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权利。

由上述分析看到，国家对农民进城限制的放松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城市政府和当地城市居民对农村移民的接受程度。因此在多大程度上让农村移民自由地进城工作、居住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选择。

正如肖 (Short 1996) 所指出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其动机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的更好的生活”。显然，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有益于移民本身，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可能没有好处，因为劳动力市场多了竞争者会影响当地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问题在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否应该一视同仁地在平等机会下公平竞争，还是以出身作为条件把城市里的机会优先留给当地城市居民？

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公平问题。不少人担心，如果农村居民毫无限制地进入城市会出现大量失业和贫穷问题，使中国的城市变成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样，充满混乱与贫困。当然，也有人倡导应该实施城乡居民公平竞争的制度，城乡居民都可以自由地流动 (陈吉元、韩俊，1996；余大兴、胡小勇，1998)。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应该尽快由城乡分割体制过渡到城乡平等体制，无论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均可以自由迁

移，找到社会上、空间上的最佳位置，自由竞争，公平发展。城乡居民是否享受平等权利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如何防止大量移民进入城市，实现城市有序发展则是一个城市管理问题。

但是实现开放式的人口管理体制，绝不是简单地打开城门让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随意在城镇公共地方开店设摊、建屋搭棚，甚至随意在公共场所露宿。也不是城镇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可以随意以低工资雇用外来人口从事脏苦累差的工作，而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安全。城市移民管理应同城市综合管理结合起来，其中的关键是实行城市规范化管理。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各种规范个人、企事业单位的法规、条例和制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而才能在开放式的人口管理体制下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城市病，使城市有序、健康地发展。

所谓城市规范化管理，首先就是外来人口与城市原有居民在政府提供的教育、住房、卫生、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享受同等权利。大部分目前由政府提供的或补贴的社会服务应逐步改为市场化经营，各种服务以不亏本经营为准则，这样才能够出现使用人口越多，服务数量与质量越好的良性循环，克服过去那种使用人口越多、政府补贴越多的现象，从而消除城市人口越多，政府和社会负担越重的怪现象。城镇居民目前享受的许多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有的应逐步取消，有的应逐步覆盖到全部人口，有些项目如社会养老保险与失业救济金等可以同在当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限联系起来，居留时间越长，贡献越大，则获得的社会保障就越好。

第二，城市规范化管理就是要对城市移民和当地居民从事各种经营活动进行强化管理，取缔乱占公共地方设摊从事经营的活动，对确有需要的菜市、集市划定专门地段，并实施收费制度。从而对经营规模过小，服务素质差、有碍城市有序发展的经营者的数量实行间接控制。国内外实践证

明小商小贩的小规模经营由于进入成本低、利润高极易形成大量外来人口的生存空间，但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则有许多消极影响。如“脏、乱、差”现象，影响环境卫生和公共交通。在香港及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法律严禁在公共马路设摊经营，违者会受到严厉处罚，商场和菜市场需要的空间则在房地产发展过程中预留，并按市场竞争价格出租或出售给各经营者。由此形成有序、清洁的城市生活和商业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最终有益于广大城市居民。

第三，城市规范化管理要对城市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进行严格管理。比如英国的法律规定一个套房中最多可以居住的人口数目，出租房屋者有责任遵守这一规定，否则就会受到处罚。这样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城市生活的相对成本，减少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的数量。因为只有在城市里找到有一定收入的职业的外来人口才能负担起基本的城市生活费用。中国许多城市的外来人口经常十多人聚居一室，生活条件极差，生活成本很低，导致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由于城市移民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存在巨大差别，这些廉价劳动力有可能会抢走当地居民的工作。为了确保城市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有必要对居民生活特别是住房条件作出控制，事实上，这也将成为最有力地控制城市移民盲目增加的措施，使城市人口增长同城市住房增长相适应。

第四，城市规范化管理要严格落实城市规划，彻底消除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乱建乱搭的状况。非法搭建住房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中勉强生存的根源之一。取缔这种乱搭乱建状况，城市移民都居住于合法的住房中，可以抑制过度城市化。

4 结语

本文探讨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的关系，认为城市管治包含二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依法进行城市管理，对各种违反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现

(下转第64页)

规划实例

PLANNING CASES

不动。

(2) 改善类建筑需保护其墙基位置所反映的四合院空间肌理,在其内部做现代居住建筑设计。

(3) 更新的建筑应具备现代住宅的使用功能及水、电、讯等配套设施,有条件的可设停车库。

(4) 地块中的保护古树及准保护古树均应加以保护。

(5) 设计应提供高、中、低档多样化的户型,以适应不同需求。

(6) 本次做出的更新设计,目的是给出设计的方向和原则,手法只是一种参考。

3.4 市政设施规划

该地区现有雨水、污水、供水、电力、电信等5种市政公用设施,它们仅分布在南北长街和西华门大街上。由于街坊内胡同狭窄,居民使用市政设施的条件很差。针对历史街区这一特殊性,规划提出以下具体对策:

(1) 居民采暖用能应使用电力,居民炊事用能应使用瓶装液化气。

(2) 电力、电信、有线电视线路应结合在综合管沟内,在极为狭窄的街坊路段,可以将这三条线路架空。

(3) 在街坊路上敷设的供水管网采用环状和枝状相结合的布置方式,雨污水采用合流制。

(4) 尽量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来解决市政设施的现代化问题。

参考文献

- 1 北京规划院,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
- 2 王瑞珠.《国外历史环境的保护与规划》.淑馨出版社,1993.
- 3 O. N. 普鲁金.建筑与历史环境.韩林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 4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9.
- 5 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6 吴良镛.《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收稿日期】2000-07-28

(上接第11页)

象加强执法力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第二是城市内外、城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调整,处理它们之间超越于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关系。大部分城市政策都会不均匀地对各个利益集团产生影响,有些是正面影响,有些是负面影响,有的可以从某项政策中得益,有的则没有任何得益。城市管治研究的核心是要协调和改进在现行法律和市场规则下合法的关系,使这种关系更趋合理。城市管治是对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调整,因此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管治的理论基础,城市管治研究要用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参考文献

- 1 陈吉元,韩俊.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2 沈建法.城市化与人口管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 3 余大兴,胡小勇.脚下的长路——中国民工现象透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4 Chan K W. Post-Mao China: a two-class urbanization in the making, Inter-

nation.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 (1): 134—135

- 5 Kantor P. The Development City Revisit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6 Lipton M.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 Lipton M. Urban bias revisi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 139—166.
- 8 McGee T G.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in: Ginsburg N, Koppel B, McGee T 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3—26.
- 9 Short. The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Cities, Culture, and Pow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62.
- 10 Simth D A. Third World Cit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Urbaniz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9—26.

作者工作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

【收稿日期】2000-06-08

书 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杂志发行部销售下列图书:

《城市化的世界》105.00元/册

《居住区规划图集》96.00元/册

《寻求快速而平衡的发展——深圳市城市规划20年的演进》160.00元/册

《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作品集》130.00元/册

《城市规划师常用规范选》(上、下册)100.00元/套

《比特之城》15.00元/册

《城市绿化系统与人居环境规划》37.00元/册

《城市学基础》22.8元/册

以上图书价格均为邮购价,如邮寄时需要挂号请另付2.00元/册挂号费。

邮购联系地址:100037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内小西楼《城市规划》杂志发行部。

联系人:刘萍 联系电话:010-68343461